

# 第一编 经济全球化与东亚区域经济



# 第一章 “东亚经济圈” 历史概观

## ——以中国和日本为中心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世界经济一体化和局域化成为时代的一大潮流。一般认为，现在，世界上已经或正在构成三大经济圈，即以 NAFTA 为中心的“北美自由贸易圈”、以 EU 为中心的“欧洲经济圈”和“亚太地区经济圈”。

有人认为现代世界经济是日、欧、美“三极资本主义”或曰“三极结构”即“作为亚太资本主义的日本资本主义”、“作为欧洲大西洋资本主义的 EU 资本主义”和“作为美洲大陆北美加中南美资本主义的美国资本主义”。而未来这“三极”再加上“中华经济圈”则有可能形成“四大经济圈”。<sup>[1]</sup>

近年来，亚洲经济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中国和越南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开放政策、ASEAN 的进口替代工业化的加强和出口导向工业化政策的推进、NIEs 工业化的成功和发展，都引起世界的广泛关注，亚洲经济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东亚地区在 1997 年爆发的金融危机中曾遭受严重打击。但从两年之后的 1999 年起连续两年再次成为世界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其经济恢复能力大大超出人们的预料。现在，学界的主要关注焦点已从当初对危机原因的探索，转为判断危机后经济增长的

新动向，开始探讨东亚能否再次持续经济高速增长，以及持续高速增长的条件等问题。

亚太地区虽然还没有形成像 NAFTA 和 EU 那样的全区域性经济圈，但这一地区的局域化的确在进行之中。例如，“ASEAN 自由贸易区”、“东北亚经济圈”（日本人亦称为“环日本海经济圈”）、“黄渤海经济圈”、“华南经济圈”、“泰铢经济圈”、“两岸台湾省、福建省经济圈”等，这些局域经济圈一般称作“东亚经济圈”。亚洲经济实际上是亚洲局域经济圈的集合体。<sup>[2]</sup>这些经济集合体到处充满着活力，不但加强了同临近各国的经济交流，而且作为局域经济合作体或“开放的经济集团”积极进行着与“圈外”、“域外”的经济交流。而局域经济圈的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与“圈外”、“域外”经济交流如何。

显然，东亚地区的这些局域经济圈都同中国和日本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资源丰富的国家，改革开放政策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亚洲的局域经济圈大都与中国内地、香港、台湾有着直接的关联。日本是亚洲惟一的发达工业国，具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和技术实力。从地理和领土上看，日本虽然不包括在亚洲局域圈内（“环日本海经济圈”除外）但日本的资本、技术、经济援助、企业经营管理技能在亚洲各地的局域经济圈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日本积极参与亚洲局域经济圈，对日本经济的发展也是至关重要的。中日两国虽然政治制度不同，但经济上有着很深的联系和很强的互补性，所以，中日两国的政治、经济动向对东亚经济圈都将产生重要影响。今后两国如何在东亚经济圈中发挥自己应有的作用，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重要课题。

## 一、“经济圈”释义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何谓“经济圈”？“经济圈”是从“圈”字派生

出来的经济学用语。汉字中的“圈”有各种含义，一般是指一种有形或无形的状态或范围。比如在社会上有以职业划分的“演艺圈”、“工薪圈”、“学术圈”等，有以人种划分的“白人圈”、“黑人圈”等，有从地缘和文化上划分的“东方圈”、“西方圈”，还有从社会体制上划分的“社会主义圈”、“资本主义圈”等等。

“经济圈”是一个新的提法，起于何时不得而知。不过，若从历史上来考察，大概可以追溯到 18 世纪英国产业革命时的“圈地运动”。作为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一种方式，英国资产阶级为修建工厂将农民的土地圈而夺之。此后，英国工业迅速发展，与殖民地开展贸易，逐渐形成一个类似经济圈那样的势力范围，这也可以说是经济圈的起源。当然，这与现在的经济圈不可同日而语，只是说，“圈”与经济活动联系在一起，也许就是从那时开始的。

日本学术界经常使用“经济圈”的提法，而中国、韩国、香港和台湾的学者一般称其为“经济区”。其实二者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只是习惯不同而已。严格说来，“圈”的含义比“区”更为宽泛一些，没有一条太明显的边界线。<sup>[3]</sup>

“经济圈”与上述表述职业特征、人种特征、文化特征及社会体制特征的各种“圈”不同，它是以国际或区域经济合作形态为特征的状态或范围。也就是说，“经济圈”是区域经济合作的一种形态。它是“超越本国的经济范围而形成的经济空间”。<sup>[4]</sup>所谓经济空间，就是指开展经济活动的空间，这种经济空间本来是在以本国经济为基础的地区形成的，否则国界便失去了意义，而国界一旦失去意义，国家也就不能成立了。所以，只要以国家的存在为前提，经济空间也就要以本国经济即国民国家范围内的经济活动为基础。当然，在这种情况下，也会允许经济活动超越国界而进行，但是这种经济活动只不过是一种交易，不同于本国经济内部的经济活动，而且其规模也不会太大，因此，它只是本国经济内部经济活动的一种补充。这样，国家为了把这种交易活动作为贸易置于国家的管理

之下，就要制定关税之类的规定，以区别在本国经济内部自由进行的经济活动。

但是，现代技术的发展已经越来越难以把经济空间控制在本国经济范围之内。例如，交通、运输手段的发达和信息系统的的发展，促进了人、物、资金甚至信息的超越国界的移动与传播。这样一来，超越国界的投资等企业活动便逐渐国际化。也就是说，随着全球一体化的进展，形成了超越国界的新的经济空间，而这就是不同于本国经济的“经济圈”。所以，“经济圈”可以说是伴随世界经济一体化，在一定区域内进行的区域经济合作的一种模糊形态。

“经济圈”有以下几个主要特点：(1)从区域经济的发展过程来看，“经济圈”是处于固定合作形态尚未形成的合作阶段；(2)从区域经济合作的组织化角度来看，“经济圈”是尚未实施紧密组织化的合作形态（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则是属于紧密组织起来的区域经济合作）；(3)从推进区域经济合作措施的角度看，“经济圈”只是按照市场机制采取必要促进措施的区域经济合作形态。所以，“经济圈”既不同于自由贸易区，也不同于经济共同体（共同市场），它只是指一定的经济区域。

“经济圈”是伴随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在一定地区进行的区域经济合作形态。随着世界经济的全球化，各地区的区域经济合作通过各种不同的形态展现出来。有的地区采取共同市场等固定的合作形态，有的地区只进行一般的合作，而不具有任何合作形态。“经济圈”则是介于这二者之间的中间形态，既不采取固定的合作形态，也不停留于一般的合作，而是按照需要采取一定形式的区域经济合作形态。

其次从区域经济合作的组织来看，“经济圈”是尚未实施紧密组织化的合作形态。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化可分为三种形态。第一，紧密组织的区域经济合作，例如欧盟（EU）、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等。第二，有一定程度的组织化或刚开始组织化的区

域经济合作，经济圈即属此类。经济圈虽有了一定的组织化，但这种组织化是民间的或政府间非正式的组织化。第三，组织化尚未展开，正在自发进行的区域经济合作形态。

另外，从推进区域合作的措施来看，经济圈只是根据市场机制而采取必要促进措施的区域经济合作形态。战后，世界各国的经济合作，主要是以关贸总协定为基础的自由贸易体制，其特点是按照市场机制进行的。但是，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部分地区一方面维持自由贸易，一方面又在免除关税、价格协定、统一货币等方面采取经济、行政措施开展区域经济合作。而经济圈的主要特点是，根据市场机制，通过平等、互惠、互利原则和非强制性协调措施，促进区域经济合作。<sup>[5]</sup>

“经济圈”与经济区的区别主要有以下几点。

### 1. 经济圈与自由贸易区

自由贸易是针对世界经济一体化而开展的世界经济合作形态，而自由贸易区则是适应世界经济集团化的区域经济合作高级形态。其主要特点是，一、加入自由贸易区的各国，必须政府直接牵头，且接受一定的联合机构对其进行经济指导。二、各国间的经济合作根据政府协定实施之。三、各国间的贸易采取免除关税等措施。四、除贸易之外，在投资等方面也相互给予优惠待遇。五、由各国构成的联合监督机构负责监督协定的实施。“东盟自由贸易区”(AFTA)和“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即具备以上特点。从上述特点来看，自由贸易区属于政府主导型的有协定依据的区域经济合作高级形态。与此相比，经济圈则是区域经济合作的初级形态，是民间主导型，且按照市场机制自发经济合作的基础，民间或政府再加以协调的区域经济合作形态。

### 2. 经济圈与经济共同体（共同市场）

经济共同体（共同市场）是向区域经济联合过渡的经济合作状态。目前世界各地已出现几个区域性经济共同体，但比较成熟的

当属欧盟 (EU)。欧盟各国以“欧洲经济共同体”为发端,直至市场统一,已进入区域经济统合的大门,这一点有别于自由贸易区。经济共同体(共同市场)的主要特点是,第一,共同机构叫做委员会,但实际上是由各成员国代表组成的“联合政府”,有很强的权威性。第二,在域内经济合作方面,“联合政府”负责决定有关贸易、投资等的方针、政策,制定相关法律,并根据这些法规协助各成员国签署条约或协定。第三,域内经济合作的主要措施,除免除关税外,还包括统一价格和统一货币,与同一国内市场无异。第四,为仲裁各成员国的纠纷,成立共同的司法机构,以保障条约与协定的实行。第五,设立共同的政治机构“欧洲共同体议会”,以谋求政治上的统一。

因此可以说,经济共同体,尤其是欧盟,与自由贸易区的根本区别在于其经济和政治的统一性,而经济共同体(共同市场)和经济圈则是区域经济合作的两极形态。但以经济统一为目的的经济圈与经济共同体(共同市场)一样,也有统一性的一面。

### 3. 经济圈与经济区

经济区是中国常用的说法,表示一定的经济区域,但它也同时具有行政区域的性质。从经济合作的角度看,经济区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国内型经济区,例如过去中国的华北经济区、华东经济区、东北经济区、中南经济区等。这些经济区是由当年设置的华北行政区、华东行政区、东北行政区、中南行政区等演化而来的,并非单独的区域经济合作形态。后来,这些行政区取消后,中国政府于1992年将中国划分为与上述行政区大致相同的七大经济区。但是,也有人认为,经济区就是局域经济圈,它将打破行政区划对各地区的分割和多头领导,形成各省、市、地区之间的横向联系。<sup>[6]</sup>另一种是国际型经济区,例如中国部分学者曾提出过的包括日本和韩国在内的“东北亚经济区”(又称“东北亚经济圈”)。从这一意义上说,国际型经济圈与国际型经济区没有本质的区别,只是叫法不

同而已，与前面所说经济圈与自由贸易区的区别以及经济圈与经济共同体（共同市场）的区别是两回事。

总之，经济圈是伴随世界经济一体化，在一定区域范围内进行区域经济合作的一种形态。其特征与欧盟及北美自由贸易区等已经组织化了的合作形态不同，是在市场机制下经济合作的前提下加以必要协调的松散的区域经济合作形态。<sup>[7]</sup>

## 二、“东亚经济圈”的构筑及其特点

“经济圈”的形成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经济上具有超越国界的国际性，二是一国的局部和另一国的局部相联合的局域性。前者形成大范围的“广域经济圈”后者形成局部性的“地方经济圈”。“广域经济圈”和“地方经济圈”之间有着密切的相关性，即广域经济圈是由地方经济圈发展、融合而成的。亚太区域经济圈即属于“广域经济圈”。

世界经济全球化与局域化是同时并存的。一方面，随着全球化的进展，以 WTO 为中心，维持自由贸易体制，实行着全球性自由贸易；另一方面，随着局域化的进展，出现了局域经济合作体，在维系自由贸易体制的前提下，进行着局域经济合作。

这样看来，全球化和局域化、自由贸易和区域经济合作等是一种矛盾的经济现象。从传统的观点来看，全球化和局域化的确是一种相互排斥的对立关系。但是，现在的全球化和局域化虽有一定的矛盾，但也并非是完全对立的。这是因为，第一，由于全球化和局域化的并存和相互制约，彼此之间对立的性质反而会削弱，从而产生一定的协调性。第二，在国际贸易中，只要以 WTO 为中心的自由贸易体制还居于统治地位，顺应局域化的区域经济合作，就只能在本区域内得到某种程度的优惠，不可能与自由贸易体制相抗衡。所以有必要对全球化和局域化的关系进行重新理解。

现在，世界经济正向北美自由贸易圈（NAFTA）、欧盟（EU）和东亚经济圈这三大区域合作的方向发展，也可以说世界经济正在形成三大经济圈。但是，亚太地区的局域化，与以美国为中心的 NAFTA（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和由欧洲多数国家参加的 EU（欧洲联盟）不同。NAFTA 和 EU 已经形成了一个比较典型的区域经济圈，相比之下，亚太地区还没有形成一个全区性经济圈。亚太地区在各方面与 NAFTA 和 EU 有诸多不同。该地区各国社会体制不同，经济发展程度不同，文化传统也不同。而且，还没有出现一个全地区各成员国都可以接受的首领国家。因此，该地区很难形成像 NAFTA 和 EU 那样的区域经济圈。

但是，亚太地区也在进行着区域化，而且具有潜在的潜力。一方面，全区性经济协议体已经出现，同时区域经济圈也在形成，出现了全区性经济协议体和区域经济圈并存的局面。关于全区性经济协议体，日本已提出各种构想，但至今一个也没有兑现。澳大利亚提出的 APEC（亚太经合组织）构想已经实现。

表 1-1 世界三大经济圈概况（1990 年）<sup>[8]</sup>

	东亚经济圈	欧共体	北美自由贸易圈
人口(百万人)	1629	342	358
面积(千平方公里)	21087	2370	21370
GNP(亿美元)	41652	49804	59081

注：东亚为日本、中国、NIES、ASEAN 合计。

在亚洲，由于全区域性经济圈难以形成，所以在一些地区已经出现“局域经济圈”。所谓“局域经济圈”，就是一些特定地区超越国境或行政区域，形成经济互补关系较强的经济空间。<sup>[9]</sup>局域经济圈大致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像 ASEAN 自由贸易区那样比较成型的局域经济圈。ASEAN 各国已经成立了政治协议机构“ASEAN 联盟”，所以能比较容易地将区域内经济合作转化为自

由贸易区。另一种类型是松散形态的局域经济圈，例如在东亚地区围绕中、日、韩等国出现的“东北亚经济圈”（“环日本海经济圈”）、“环黄渤海经济圈”、“华南经济圈”、“泰铢经济圈”、“两岸经济圈”等。这些局域经济圈一般统称为东亚经济圈。

以构筑“自立经济”体制为己任的“东亚经济圈”，60年代以后的形成过程及其特点，大体上可分为三个时期。

#### （1）60年代

60年代中期，尽管日本出现过一次较大的经济萧条，但整个60年代，日本都在通过借款和信用输出，积极参与东亚亲美国家和地区的“自立经济”体制的构筑。尤其是1965年以后，日本经济由过去的民间设备投资为主导转向以国家财政和出口为主导的高速增长阶段。当时，亚洲国际纠纷的热点由中印边界转向越南。因此，日本趁机迅速扩大了对南越政权和卷入越南战争的东亚亲美各国的贷款和信用输出。例如，1965年以缔结日韩条约为契机增加了对韩国的贷款，同年，趁美国中止对台援助之机，增加了对台的日元贷款，同时，对南越及其周边的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贷款也急剧增加。在1970年以前，日本的日元贷款总额（双边援助）达15.2亿美元，其中9.9亿（占总额的65.1%）投向东亚地区。<sup>[10]</sup>这些日元贷款对构筑“自立经济”体制发挥了重要作用。

#### （2）70年代前期

70年代初，尤其是以1971年末第一次日元升值为契机，日本对东亚地区的直接投资开始急剧增加。日本的民间直接投资由1971年的8.6亿美元增加到1972年的23.3亿美元，增长了1.7倍，1973年又一举增加到35亿美元。<sup>[11]</sup>

这一时期，日本对东南亚直接投资急剧增加的主要原因，一是力图构筑“自立经济”体制的东亚亲美各国在60年代末出现外汇恶化的情况；二是日本经济已经处于高速增长的高峰。因为高速

增长的日本经济以 1970 年萧条为契机达到资本过剩阶段，随着贸易黑字和日元升值，这些过剩资本流入东亚各国。

这一时期，日本企业进入东亚的主要部门是以纺织和电机为代表的劳动集约型产业。70 年代前期日本对亚洲投资总额的 30% 集中在这两个部门，而且，日本企业在东亚地区雇用的 16 万工人中，60% 也集中在这两个部门。<sup>[12]</sup>以纺织和电机为代表的日本企业，大都以合资的形式进入东亚地区，其主要合作伙伴是掌握流通领域的当地民间资本（东南亚以华侨为主）。

这样，70 年代以后东亚国家和地区的“自立经济”体制，在日本直接投资主导下建立起来。但是，日本直接投资主导下建立起来的“自立经济”体制，在该体制内部带来了新的矛盾和对抗。因为日本的直接投资导致这些国家大批中产阶级没落，激化了包括民族对抗在内的劳资对立。以劳资对立为基础的民族对抗，以 1972 年末泰国的抵制日货运动为导火线，发展为遍及整个东南亚的排日运动。

面对大规模的反日运动，日本垄断资本和自民党政权开始大力调整日本的对外投资政策。1973 年 6 月初，以“经团联”等五团体的名义发表了《对发展中国家投资行动指针》，这可以说是这一调整政策的宣言。“指针”提出了“融入当地社会”、“为当地服务”和“录用当地人”三原则以及“将更多份额让予当地”的口号。这些原则受到当地的广泛欢迎，但对日本企业家来说却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举措。其实，这些原则和口号从根本上来讲是符合日本垄断资本利益的，因为“自立经济”体制本身，就是为了强化亲美政权在产业和财政方面的基础，以抵制民族解放运动，当地中产阶级、工人和民间资本家的不满，显然会动摇亲美政权的统治基础，所以作某种程度的让步，有利于加强“自立经济”体制的基础，当然也就符合日本垄断资本的根本利益。

### (3)70 年代后期

正在顺利构筑中的“自立经济”体制在 1973 年末发生的第一次石油危机中遇到困难。因为，东亚各国或地区在构筑“自立经济”体制的过程中迅速提高了对石油能源的依存率，原油价格的上涨动摇了其经济基础。1974 至 1975 年间，东亚各国或地区的经济增长率全面下降，直接威胁着在高速增长下建立“自立经济”的亲美政权。

但是到 70 年代后期，东亚有些国家和地区很快摆脱石油危机，保持了与 70 年代前期相差无几的高速增长。这就是韩国、台湾、香港和新加坡这“四小龙”。70 年代后期“四小龙”和其他东亚国家（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之间拉大了差距，即出现所谓新兴工业经济群（NIES）和非新兴工业国的区别。

那么，第一次石油危机之后，在世界经济普遍停滞的情况下，为什么在东亚出现了所谓新兴工业国这样的持续增长地带呢？换言之，为什么第一次石油危机之后在东亚各国出现了这样的差别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有必要探讨一下建立和运作“自立经济”体制需要哪些国际条件和国内条件。

60 年代初计划构筑这一“自立经济”体制的美国最重视的国际条件，是如何建立国际分工体制。换言之，就东亚亲美各国或地区而言，也就是怎样建立体现自身特色的出口产业以适应美国的需要。而上述“四小龙”经过十余年的努力，较为成功地构筑了能体现自身特色的出口产业。韩国、台湾和香港，都充分发挥了其低工资的优势，引进日本外资，在纺织和电机两个部门建立起稳固的出口型产业，从而打进了欧美、日本，甚至进入“充满石油美元”的中近东亲美产油国市场。新加坡就其地理条件而言，早就是“东南亚域内交易圈”的中继贸易基地，新加坡在精炼石油和电机产业方面，打进了欧美、东南亚乃至日本市场。尤其是 70 年代后期，向中近东亲美各国（沙特阿拉伯、科威特）扩大出口，对上述新兴工业国（地区）的经济高速增长发挥了巨大作用。这是四个新兴工业国地

区)获得成功的重要原因。而未能新兴工业化的其他国家,则一直没有建立起出口型产业,而不得不处于新兴工业国的附属地位。

至于国内条件,60年代初,计划构筑这一“自立经济”体制的美国方面最重视的国内条件,是在政治稳定的前提下,出现能担负“自立经济”重任的年轻气盛的政治家和企业家。具体来说,就是首先建立一个有足够能力推进构筑“自立经济”体制的稳定亲美政权,在此前提下,(1)培养一批能运营“自立经济”体制的经济官僚;(2)培养一批能取代进口并促进出口产业的企业家集团;(3)普及义务教育,推动反共教育,在此前提下,培养廉价而优质的工人队伍。新兴工业国家和地区,在这几点上基本上达到了美国的要求,但在一些非新兴工业国家却未必能做到。第一次石油危机之后,这些差别更拉大了东亚亲美各国构筑“自立经济”体制期间的差距。

但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在渡过第一次石油危机的过程中,包括所谓新兴工业国(地区)和非新兴工业国(地区)在内的东南亚亲美各国(地区),都以增加对日出口和对日进口的形式加强了同日本的联系,纳入“东亚经济圈”之中。70年代以后,东亚各国的对日出口,以纺织和杂货为主开始增加,到70年代后期,日本对东亚的投资重点由过去纺织、电机、杂货转移到钢铁、有色金属和石油化工,这样一来,东亚的对日输出种类也有所增加。对日出口急剧增加的原因,一方面是日元升值导致的经济因素,同时也是由于美国和东亚各国的强烈要求。因为东亚亲美各国(地区),不论是新兴工业国还是非新兴工业国,都长期对美出超和对日入超,形成美元经由东亚亲美各国流入日本的局面,而为了阻止美元流入日本,使美元在构筑东亚亲美各国“自立经济”方面发挥作用,就必须扩大对日出口。70年代以后,尤其是进入80年代,日本的市场开放,不仅是针对欧美,也十分重视东亚,其原因就在于此。所以,迫切希望通过建立“自立经济”体制巩固“东亚经济圈”的日本

企业界，由于东亚各国的原因，极力在纺织、杂货、电机等部门开展整个企业的合理化，强制进行关、停、并、转，努力扩大从东亚各国的进口范围。当然，这一企业内部整顿也导致垄断资本和中小企业之间的对立矛盾。

总之，东亚亲美各国（地区）和日本这期间通过进出口、直接投资和贷款，以构筑“自立经济”体制为目标，取代美国，形成了一个经济圈，即“东亚经济圈”。例如，1990年东亚地区各国（地区）之间的相互出口达2045.7亿美元，比上一年增长11.5%，占其出口总额的31.9%。同期对美出口为1744.4亿美元，占其出口总额的27.2%，比上一年减少4.7%。<sup>[13]</sup>而在1985年，东亚地区内部相互出口比重只占25.3%，对美比重高达34.2%。从这些数字不难看出，东亚经济圈正在形成。

东亚各国的青年人比例远远高于其他地区。30岁以下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东亚为70%，欧盟为30%，美国为40%。<sup>[14]</sup>这一人口资源的潜在力正是21世纪东亚振兴的巨大原动力。

华侨在东亚经济圈中发挥着相当大的作用。华侨分布在以亚洲为中心的世界各地，全世界华侨人口超过3000万，其中90%集中在东南亚。东南亚的华侨人口占该地区总人口的比重平均10%以上，达2800万人，其中泰国10%，新加坡75%，马来西亚30%，印度尼西亚4%，菲律宾1.3%。<sup>[15]</sup>而华侨在这些地区的经济实力远远超过了其人口的比率。华侨企业侧重于流通、贸易等商业领域，资本日益雄厚的华侨，正在扩大其零散的家族式经营，形成企业集团跨越国界发展。

华侨的共同特点是有一种“落叶归根”的归属感，敬祖的儒家思想和衣锦还乡的传统意识以向祖国投资的形式表现出来。中国改革开放以后，东南亚华侨企业对华投资剧增，这正是华南经济圈迅速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

1992年1月，邓小平视察深圳特区，发表南巡讲话不久，东南

亚地区华人在香港召开“中华经济合作国际研讨会”，会议的主题是大中华经济圈构想，探讨了经济圈形成的可能性及其展望。

1992年6月，在美国斯坦福大学也召开了同样性质的研讨会。

但是，华侨在东南亚各国也常常受到“排华”的困扰和诸多不公正的待遇。1995年印度尼西亚曾发生严重的排华骚乱，其他国家，如马来西亚采取当地人优先的歧视华人政策。尤其是大中华经济圈构想，引起东南亚各国和日本的疑虑，担心会对他们形成威胁。

当然，“东亚经济圈”内也存在诸多问题 现在还不能说已经形成一个稳固的经济圈。因为东亚地域辽阔，民族构成复杂，政治体制各不相同，经济发展很不平衡。过去，东亚经济圈形成的最大障碍是体制上的差异。冷战结束后，这种差异正在逐渐消除，但仍存在宗教、社会结构和语言上的障碍。东亚的宗教主要有佛教、回教、儒教等，这些宗教过去对该地区的现代化和经济发展都形成了一定的阻碍。在语言方面，东亚经济圈有日语、汉语、朝鲜语和泰语等，不像欧美那样有英语、法语、德语等通用语言。日本在经济实力上虽能发挥带头作用，但日语很难成为亚洲的通用语言。

80年代以后，“东亚经济圈”的形式、性质、范围和内容等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逐渐形成新的意义上的局域经济圈。这一局域经济圈的形可以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亚洲冷战结构的缓解。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标志着东西方冷战结构的基本结束。中国在推行改革开放政策的过程中，采取了与周边各国改善外交关系的路线。首先，同韩国建立经济贸易关系，随后中韩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在中韩建交的情况下，朝鲜也开始谋求改善同美国和日本的关系。中国内地和台湾地区的经贸关系和人员往来也有了突破性发展。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冷战格局的结束，大大促进了局域经济圈的形。

第二，在亚洲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开放的过程中，随着中央权力下放，地方权力扩大，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政治、经贸关系以及人

员往来得以迅速展开。中国沿海各省市在“放开、搞活”的政策指导下，“乡镇企业”等新经济主体迅速发展、壮大起来。这些企业可以根据自己的意志决定与外资企业的联合，“合资”、“独资”企业迅速增加。事实上，广东、福建等省乡镇企业与香港、台湾企业之间建立的委托加工合同关系，是推动这些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三，一般认为，世界经济的重心开始从大西洋沿岸地区向太平洋尤其是西太平洋沿岸地区转移。在此共识之下，世界各国和地区加速了同亚太各国的经济交流。经济一体化成为不可阻挡的世界发展潮流。

在亚太地区，全区域性协议体和某一地区的局域经济圈是同时并存的，所以，这一地区的区域经济合作体制是一种双重结构。从区域经济合作协议体来看，APEC 和东亚经济协议体（EAEC）等是相互重合的。从局域经济圈来看，大大小小的局域经济圈也是互相重合的。例如，“ASEAN 自由贸易区”是局域经济圈，但其成员泰国等与周边印支各国和中国西南部分地区正在形成“泰株经济圈”这也是“ASEAN 自由贸易区”和“中国经济圈”的重合。

另外，东北亚地区的“环黄渤海经济圈”、“环日本海经济圈”等，一方面本身是一个局域经济圈，同时它又涵盖在范围更广的“东北亚经济圈”之内。这样，在亚太地区，全区域性协议体和局部区域性协议体、大型局域经济圈和小型局域经济圈相重合，形成多重结构。这种多重结构必然会在各区域协议体和局域经济圈之间发挥桥梁作用，所以也可以说是形成了一个局域经济圈网络。

从这一意义上说，这些局域经济圈网络构成亚太地区全区域性经济圈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也就是说，小型局域经济圈一方面保持其独立性，一方面与大型局域经济圈相联系，几个大型局域经济圈又相互沟通，发挥全区域性协议体的机能，从而有可能逐渐形成一个亚太地区经济圈。这种全区域性经济圈也具有双重作用，